

散文卷

重庆作家作品
年度选

重庆市作家协会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辛 华 陈 川

编委会副主任 冉 冉

编委会主任助理 陈 飞

本 册 主 编 吴景娅

本 册 副 主 编 刘建春 吴佳骏

编 委

辛 华 陈 川 冉 冉 张 者 蒋登科 王本朝

王顺彬 吴景娅 刘 东 戚万凯 陈 飞

总序

Foreword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激发全市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与活力,推动重庆文学事业繁荣发展,重庆市作家协会组织编辑了《重庆作家作品年度选》丛书。

该丛书共计六卷,即《重庆作家作品年度选·小说卷》《重庆作家作品年度选·诗歌卷》《重庆作家作品年度选·散文卷》《重庆作家作品年度选·报告文学卷》《重庆作家作品年度选·儿童文学卷》《重庆作家作品年度选·文学评论卷》,汇集和展示了重庆作家近年来在全国各类报刊发表和出版的优秀作品。这既是一次检阅,更是集中的推介,希望通过这一载体和平台,让广大读者全面领略重庆文学近年来的成就和风采。

《重庆作家作品年度选》的选编工作由重庆市作家协会各相关文学创作委员会组织实施,市内外知名评论家也分别予以了点评,在此一并致谢。

重庆市作家协会

2019年3月

序言

P r e f a c e

在时光的深处,盛开如初

黄桂元

重庆的文学水土一向得天独厚,别具风骨。其卓然不凡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底蕴,决定了重庆散文写作有着不可复制的自身优势——多层面的立体存在、多维度的观照视野与多元化的文化个性。在这座现代与传统交汇、时尚与本土同辉的超大城市,似乎更容易刺激诗意的分泌,而不是故事的滋生。重庆散文界没有甚嚣尘上、俗众追捧的“明星”,却不乏暗香浮动、隐秘盛开的书写群体。当铺天盖地、光怪陆离的消费主义大潮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他们仍固守高贵的、诗性的、理想主义的写作信条,格外关注个人的命运、人格、尊严、欲望等生命哲学与伦理问题,并以谦卑、孤独而执着的辛勤劳作,为这个神话与忧患俱在的无序世界和苍生命运,带来了警醒、反思、追问、求索,还有自我救赎的深邃梦想。他们认定,散文家未必是启蒙者、教化者、拯救者,但这个时代不能只有娱乐、游戏和口水,而没有精神的家园栖居与灵魂的芬芳四溢。

与诗歌、小说、戏剧不同，散文是一种实打实、无遮蔽，最能检验作家综合实力的文学样式，任何刻意以意象藏拙、以虚构化妆、以戏剧调味的图谋，都与散文的自由本色相悖。只靠学识，难免沉闷；只靠思想，流于枯涩；只靠体验，失之单薄；只靠灵性，极易油滑。同时，散文也不拒绝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比如，一些小说家的散文之所以受到部分读者的偏爱，大约与其落笔实在，行文节制，善于植入叙事元素不无关系。

黄济人的《沱江水暖》忆述了其代表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出炉的前因后果，旧事重提，并非“好汉”话说“当年勇”，而是对一段铭心岁月的深情回望，而关于“《将军》的成功首先是题材的成功”的结论，是经验，也是锐见。那时黄济人还是内江师院的普通学子，从酝酿、采访到初稿杀青，皆有师生相助，装订30多万字的厚厚手稿，“于是有同学捡回来钉棺材用的长钉子，外加半块砖头，抡起胳膊，对准稿纸，奋力打洞。洞未打穿，稿纸破了边角，心痛得我欲哭无泪”，另有同学用烛火烧红铁丝在稿纸上穿孔，再用结实的麻绳系牢，其坚固性胜似“海枯石烂”，此类细节朴素内敛，暗香浮动，堪称小说家的拿手好戏。余德庄的《思思》写一只小狗的短促一生，字里行间，饱含怜爱，细腻入微，笔意绵长，直击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陪伴思思治病的过程更是引人牵肠挂肚，唏嘘忧伤。散文不必像小说家那样讲究故事性，但故事性无疑会为散文添加悬念和看点，作家深谙其道，运笔生辉，只是文尾议论似有“蛇足”之嫌，若能精简，效果更佳。

傅天琳的《鱼要回家》是一篇足以惊神泣鬼的凄美之作。一对三文鱼产籽数千，孵化仅数百，鱼群入海后从大西洋洄游，历时四年行程万里，躲过无数狂风、巨

浪、人和鲨鱼的追击，最终回到出生地的只有两条，还要为繁殖后代“在完成产卵受精后雌雄双双死去”。三文鱼洄游是奇迹，是神话，也是宿命的轮回。傅天琳不是在复述一个传奇的科普知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缺少的不是知识，而是对卑微生命的大悲悯与大情怀。吴景娅的《你不知道上帝何时翻脸》则以重金属般的文字敲击秘藏岁月深处的骇人真相，诉说的是人的命运之殇。茫茫天地间，一切神秘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人的命运。“上帝”突发脾气，在武隆制造了地狱，也隆起了人的脊梁，他们推动西西弗斯的滚石，向极端霸道的大自然发起绝地反击。散文面对“大地和在场”，诗歌面对“星空和神祇”，两者经吴景娅的诗性整合，得以血乳交融，互为增值，直抵“文以气为主”的书写境界。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散文家如果仅仅有眼、口、鼻、耳的肉身依托，而缺少对人类命运的大爱与大恻，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在场”，写出的只是果壳“现实”，而不是真正意义的“存在”。

张于的《未展芭蕉》以个人祖上与虚谷的神秘渊源为背景，宁静致远，内功深厚，描述了一代海派大师的奇幻命运和艺术踪迹，对此，我们需要有“精英式阅读”的心理准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尽管毁誉不一，却无人能够否定余氏散文在中国当代文化散文写作的开拓性意义，顺延这个现象级散文流向写出自己的一方天地，需要视野，需要才学，也需要非一日之功的艺术修为。张于将隐秘的个人关系史与灵魂自传，独特的私人视角与民间语境浑然相融，在他的深缓激愤的独自行吟和恣意漫想里，可以感受到隐忍其间的孤傲、品性和志趣，道破天地寂寥，写尽旷世孤独，如布鲁姆所说：“这份孤独终究是一个人与自身有限宿命的相遇。”

李钢的《王者牡丹》和唐力的《远行：火车站》表明，诗人也可以放弃直抒胸臆，以知性与智性为散文的“主打”内容，一展辞章家特有的文墨风范。以花喻人，以物托志的笔法，中国文学古已有之，本不新鲜，就看写作主体是否足够强悍，《王者牡丹》便是典型的“案例”。李钢是重庆文坛的异数，体内混杂着齐鲁文化、江浙文化、巴蜀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基因，却又能在散文写作中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出神入化，言近旨远，他自称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那一类，即便正逢花期，也只是静静地一睹王颜，决不会花前花后地逢迎，像个弄臣”，他视李花为“我的姓氏之花”，其鲜活洒脱的不羁个性，跃然纸上。唐力的《远行：火车站》可称为“神来之笔”，他把地理人文背景移入火车站，再切割成若干哲思“盆景”与红尘断章，透过寻常物象写出其内在的复杂性。小小挂钟“一支指着离情，一支指着别意。还有一根在摇摆，始终无法安定”；售票大厅是火车站的胸腔，分布着很多心室和路线；候车室里，“所有的旅客都带着自己的省份在行走”，其寓意新奇，想象葱茏，含英咀华，使人玩味。这种借喻能力在李晓的《食物的灵魂》中亦有惊艳表现。民以食为天，“一粒大米，从种子出发，到颗粒归仓”，自有灵魂的冥冥驱使，那些土豆、南瓜，以及所有的城市小吃、乡村美食也都是有灵魂的，它们喂养着芸芸众生的“胃”，也维护着人类活下去的尊严、良知和“诗意存在”。

曾听到许多朋友直言已经不再读游记散文了，个中玄机，并不费解。如今资讯发达，旅游成风，“到此一游”的无脑文字泛滥成灾，多少损害了游记散文的口碑。游记散文应该拥有独立的美学品质，写游记让人感觉不出是游记，才是散文的上佳境界，这个意义上，吴佳骏的

《巴廉寺的黄昏(外一篇)》可以说具有某种范本价值。他把灵魂化入客体世界,物我无间,浑然流动,近乎喃喃自语。他不习惯在散文中交代背景知识,堆积通用资料,诸如年代怎样,地貌气候如何,民俗风情有哪些,等等,各类旅游攻略的小册子都有,不劳作家提供。这位青年才俊在意的是人文风景而不是自然风光,是神游而不是身游,“我们肉身回不去的地方,就用记忆去抵达;记忆抵达不了的地方,就用心灵去凭吊”。无论巴廉寺,抑或大山包,不过是吴佳骏“流浪”人生途中的驿站,重要的是构建自己独有的精神文系或灵魂版本。刘建春的《大美博尔塔拉》拒绝散文沦为千篇一律的“导游词”,他一路西行,目光深沉,思潮涌动,文采飞扬,为大美新疆赋予哲思与诗意,在纸面营造出了“山因水而更显灵气,水依山而愈发妩媚”的动态美学氛围,令人目不暇接,如临其境,久久回味。金铃子的《我打着油纸伞走过李庄》引领读者进入蒙蒙的烟雨深处,与她分享李庄的过往沧桑与岁月惆怅,她不是为了表达尖锐的历史追问,而是释放一种对旧时光的凭吊与敬畏。有着古雅韵致的李庄“从来没有忘记一个人,只要你看它一眼,你就会成为这里的一块青砖、一条鱼、一滴江水”。富丽曼妙的诗意文体流淌着给人好感的诚恳和亲切,以及优裕教养所玉成的那一份从容和轻柔。刘运勇的《黔江峡谷城》溯源了一个地域传奇的来龙去脉,悲欢离合,几千年的岁月造就了旧城,30年的时光又魔幻般地添了新城,其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想象与动荡的命运兴衰,全篇景色森然,架构均衡,画面凝重,语言劲道,昭示了一种醒目的文墨气象,散文的世界应该是立体的、动态的、弹性的,需要作者完成对山川地理、故土乡河、人生岁月、社

会百态的认知刷新与审美整合,使之既有原生态,又具现代感。

嘎子的《康定,那条穿过记忆淌过童年的河》写了两条使他终生刻骨铭心的水系,即来自折多雪山的折多河,与来自雅拉雪山的雅拉河,“两条河,温柔的、粗犷的、甜腻的、狂暴的、沉静的、喧闹的、冰冷的、热情的……混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真正的康定人”。置身于“他乡年代”,嘎子以他农民式的执拗仍活在故土的童年时光,他常常从器器市声中悄然抽身,回望故乡岁月,谛听灵魂细语,这时候词语在他的笔下不再是单线联系,而是冥冥之中的灵魂独舞。对于另一类结满乡愁的作家,植根于记忆深处的不只有故乡陈年旧事中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性、婚丧嫁娶、四季轮回,更多的是命运的起伏、荣枯与生灭。何春花的《时间的缝隙》叙述了一种走不出大山的宿命感,望着堵在村庄门口的大山,“我在这细弱的呼叫声中看见了光,看见了满天的米朝我落下来”,却终于发觉,大山外面堵着的还是大山,作者以无尽的苍凉笔触,道出人的欲望和能够实现欲望之间何以有着永恒差距的巨大困惑。通常说,散文习惯于审美,之所以走上“审丑”,也是出于无奈。张蔓莉的《看桃花》写了一家乡村女人万劫不复的命运遭遇,这个故事因过于惨烈而枝蔓凌乱,使人不忍卒读。病体的丑陋、生命的低贱、灾难的重创、本不关桃花的事,却又偏偏祸起“看桃花”,荒诞的命运悖论带来的不是瞬间的刺痛,而是难以愈合的钝痛。杨犁民的《渐渐走失的村庄》是对村庄何以走失的近乎绝望的仰天长叹,在茫茫天宇犹如空谷足音,“村庄它有脚,此刻正一步步地向着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走啊走啊。它走在无边的岁月里,孤独而持

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村庄走失了，又去哪里找寻那方水土，那片人烟？史铁生曾说：“（散文）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正是这样的困境成了他们的写作资源和共性痛感，而别无选择。不过，我们知晓其故乡的身世之谜，大致也可以看到此类写作的某种发展极限。

重庆文学也会出现边缘或“外省写作”常有的“尴尬”和“焦虑”，但这样的“尴尬”和“焦虑”，未必不会形成自我激励的动力。事实上，文学表达与地域维度的内在关系固然不容忽视，却也不宜过度放大，“文学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的语言上和文学上的传统”。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必然催生文学经典的物质前提和地域沃土，文学经得起岁月的推敲才是硬道理。无论作家身处“中心”还是“边缘”，闹市抑或孤岛，都不会改变文学的真正属性。对于重庆作家，置身边缘写作可以减少文坛是非的干扰，而保持相对纯粹的思虑状态；置身边缘写作可以不受文坛时尚的蛊惑，而心无旁骛，盛开如初。如此想来，又何乐不为？

黄桂元，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一级，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百余家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与批评文章300余万字。获国内文学奖项多次。曾任第八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001 总序
- 001 序言 在时光的深处,盛开如初 > 黄桂元
- 001 沱江水暖 > 黄济人
- 007 鱼要回家 > 傅天琳
- 013 未展芭蕉 > 张 于
- 028 思 思 > 余德庄
- 045 王者牡丹 > 李 钢
- 049 巴廉寺的黄昏(外一篇) > 吴佳骏
- 055 大美博尔塔拉 > 刘建春
- 062 你不知道上帝何时翻脸 > 吴景娅
- 072 我打着油纸伞走过李庄 > 金铃子
- 077 渐渐走失的村庄 > 杨犁民
- 081 远行:火车站 > 唐 力
- 087 康定,那条穿过记忆淌过童年的河 > 嘎 子
- 095 黔江峡谷城 > 刘运勇
- 105 徜徉在白鹿原上 > 邢秀玲
- 110 桃花林内有吾村 > 邓高如
- 115 放 学 > 王 雨
- 117 一块冰箱贴 > 李显福
- 121 土家龙船调 > 向求纬
- 124 华盛顿街头的松鼠 > 再 耕
- 127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记住您 > 辰 湄

261	乡村五行	› 汪 渔
269	河 生	› 文 猛
275	黑糖果	› 张 鉴
283	为乡愁,架一座致远桥	› 张 涌
286	川江的生命之歌	› 陶 灵
294	乡村雪	› 邹安超
297	同心树	› 粟绿墙
300	行走黑山谷	› 钱 昀
303	磨的命	› 杨旭军
306	百岁外爷	› 周鹏程
309	七夕诺言	› 疏 影
313	编后记	

沱江水暖

■
黄
济
人

我的处女作《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从构思、采访、写作，直至初稿的杀青，全部都是我在就读内江师专（现内江师院）期间完成的。于是，沱江之滨的母校，便成了我文学之路的出发点。人在征途，免不了左顾右盼，左边是田园风光，让人赏心悦目；右边是高楼大厦，让人乐不思蜀。可是，只有掉过头去，回首往事，那发生在母校校园里的点点滴滴，才能正中心窝，直抵肺腑，让我欢忭莫名，让我温馨无比。

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进校的。拨乱反正之初，文艺谈不上复兴，却也开始解冻。我们坐在教室里，总听得见冰雪消融之后，春水顺着屋瓦，滴落在屋檐下面的声音。我读的是中文系，和班上多数同学一样，想写点儿东西，或诗或文，或长或短，然后寄往复刊未久的文学杂志或者报纸副刊。诚然，写作除了有欲望，还得有生活，有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是作家的本钱。我的本钱是八年之久的知青生涯，期间担任过生产队长、代理教师以及先用钢板刻写然后油印出来的公社机关报的主编，就是说，在广阔天地里，我收获了生活，也收获了素材。事既如此，写作就开始了，我写的是长篇小

说,因为落户的山区盛产金银花,所以小说的名字取为《金树银花》。写得还算顺手,虽说只能利用课余时间,但半学期下来,也有了十万字的篇幅。

就在这样的時候,我的思路被一件重大的家事打断了,那就是家父的冤案获得平反。家父系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任地形学教师,20世纪60年代转业回重庆,在江津县(今江津区)政协任职。“文化大革命”运动伊始,家父以“反革命”罪被捕,不久惨死狱中。得知平反的消息后,我告假从内江回到江津,参加家父的追悼仪式。除家人以外,远在南京的舅父邱行湘也赶来了。舅父系家父黄埔五期同学,洛阳战役中,他以国民党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身份与黄埔一期校友共产党将领陈赓对垒,尔而战败被俘,成为最早的国民党战犯。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生活了整整12年之后,国庆十周年之际,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特赦令,他成为第一批获赦人员之一,被分配到江苏省政协任文史专员。与家母见面,与我们兄弟姐妹见面,舅父谈得最多的,是他在共产党监狱里生活的经历,与得知家父恢复了革命军人名誉时的愉悦心情一样,他由衷地感激新中国,说共产党对他有再造之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把国民党将领在共产党监狱里的生活内容、心理历程,与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题材联系在一起。

回到学校,夜不能寐。我把这个题材与那个正在进行中的知青题材作了比较,孰重孰轻,抑或谁急谁缓,半月之余,仍无结论。教我们文艺理论的老师叫李北星,因为博学多才,见解独特,所以我和同学们与他多有接触。“有困难,找警察。”李老师不是警察,却是我心中的北斗星。听完我的困惑,他似乎眼睛都没有眨一眨,便把观点向我和盘托出:“写知青题材的人很多,而且很多作品写得不错,比如在贵州下乡的上海知青叶辛,他在重庆《红岩》杂志上的三部长篇我都看了,一部比一部好。你如果写得比他还要好,恕我直言,你仍是他手下一个兵。但,另一个题材就不同了。这样的题材过去没有,内容也鲜为人知,而且,重要的是,你写这个作品的条件得天独厚,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情,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那部尚未完稿的《金树银花》,采用的文学式样是长篇小说,而这部决定要写的作品,又该采用什么样的式样呢?“当然它应该是纪实的而非虚构

的。”我把又一个困惑的皮球踢给中文系教授陈应祥的时候，这位有着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教资历的学术权威不假思索地对我说，“内容决定形式。如此重大的题材，包含着政治、历史以及军事诸多方面的意义，你如果采用虚构的编故事的手法去写，比如说把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解放军公布的头号战犯杜聿明写成杜大明，把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写成张维，那就可惜了个题材了！”

李老师的话，如同指路牌；陈教授的话，恍若探照灯。虽说如此，我心里明白，有一只皮球是踢不出去的，那就是写作自身。不同的文学式样有不同的写作方法，如果按照小说来写，我立马可以动笔，我可以依据舅父告诉我的事情，凭借想象力去虚构人物、编织故事、制造悬念，直到演绎得自己满意为止。然而，这样的想法并不实际，因为这不是我的生活，而且父辈的经历也不可以取而代之，况乎后人对于前人的了解与理解毕竟是有限的。如果按照纪实来写，写作之前的准备又远未就绪。不言而喻，这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路。我需要在上课时间，阅读现代当代历史，尤为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需要在下课时间，去图书馆搜集资料，摘录文件。当然，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需要外出采访，拜访几十位健在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原国民党将领，聆听他们的经历，尤其是发生在战犯管理所里的故事。诚然，这又是一条艰辛而泥泞的路。倘若事先我能预测期间的苦涩与窘迫，我是出不了门的。关于发生在采访期间的东西，因为与校园无关，所以不在这里表述。反正当时年轻气盛，又不曾发表一个字，没有压力，没有包袱，亦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想走就走了。

我是在母校第一个暑假的第二天离开内江的，为了赶时间，我没有回重庆，而是在学校的食堂里买了十几个馒头，装在军用挎包里，然后急匆匆去了壕子口火车站。我的第一站是南京，要找的人就是我的舅父邱行湘，因为他被俘得早，早在三大战役之前，在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攻克的第一个城市堡垒中就被俘，所以他将成为我全书的贯穿人物。诚然，我与三大战役的国民党战场最高指挥官们素昧平生，不曾谋面，我需要通过舅父的书函引荐，去南京以外的其他城市，找到辽沈战役中的郑洞国、廖耀湘，平津战役中的陈长

捷、杜建时,以及淮海战役中的杜聿明、文强、黄维。当然,也包括济南战役中的王耀武,西南战役中的沈醉。就是说,但凡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将领,不管是起义的、投诚的,还是被俘的,我都希望面见他们,因为在第一手资料的收集方面,自然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行程近月,受经济拮据等诸多条件所限,我的采访计划充其量完成了一半。但,不管怎么说,军用挎包里的馒头,变成了满满一堆资料,我还是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沱江之畔。

《金树银花》早已从我的案头撤下来了,代而存之的,是一张崭新的稿纸。说起案头,恐怕现在的在校学生们难以置信,40年前的校舍里,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有的只是密密麻麻的上下铺,按照顺时针方向,紧紧地连在一起。说来奇怪,我的铺位与相邻的床头,恰恰出现了一道缝隙,而后将两张木床相向挪移,居然挪出了两三尺的距离,更为奇怪的是,两三尺的上方,竟然有一个窗口,这对烟瘾不小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就在这样的空间,我找来砖头,作为桌脚,我抱来木箱,作为桌面,开始了先前的《金树银花》的写作。

现在题材变了,落笔之时,不知怎的,我突然觉得桌面比过去宽阔,桌脚比过去坚实,较之过去的写作,我更觉得心里有话要说。用今天的语言讲,我这本书写作之初便进入状态,便找到感觉,所以进展顺利,自信满满,不到半学期,已写毕20多万字。前面说过,暑假外出采访,未能尽如人意,想要补漏拾缺,务必再度外出。这样,利用寒假,又去北京,绕道上海,在开学的前一天,回到重庆。再用今天的语言问,“时间都到哪儿去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伴随沱江的逝水,都流到我的案头上来了。毕业之前,学校要组织实习,实习之前,我这部3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已经脱稿了。关于书名,我暂定为“功德林”,因为北京近郊的这座禅院曾被日本人改造成模范监狱,以后改建为北京战犯管理所,来自全国各地的战犯都先后来到这里。至于最后定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那是在隆昌一中实习时期,应邀去北京改稿,由参与改稿会的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建议的,用他的话说,不要用“功德林”这三个字,北京人一听就知道那是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地方,给人以灰暗的感觉,现在是新时期了,战犯过去的身份是将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而且需要反映的。